

# 第一章

## 战前背景、态势析要

日本的 15 年侵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近百年对外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亦是其大陆政策的总决算。因此，要分析与研究这场战争，就必须从明治维新时期的内外政策谈起。

### 1. 日本军国主义与大陆政策

#### 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日本国本土由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等 4 个大岛及若干小岛组成，面积约 37.2 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东北地区面积约 1/3。地面起伏多山，海岸曲折复杂。历史上战乱频仍，直到公元 15 世纪末才完全形成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家。长期的割据混战，使日本社会极富于尚武传统。

早在 11 世纪前后，随庄园经济的兴盛而产生了武士阶级。武士以征战杀伐为职业，具有浓厚的宗族与主从依附特征。1192 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君临全国。武士的总头领受封“征夷大将军”，组建幕府，执掌国家政权，而皇室只具有名义上的权威。随后，武士统治日本长达 800 年之久，其“武

家习气”、“弓矢之道”等也发展成为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又汇入了中国的儒学，特别是在江户幕府（1603～1867）时期汇入朱子学，倡导和发展了“得主尽忠、交友守信”等封建伦理，形成为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产生巨大飞跃，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同时具有了更为独特而明确的思想特征。武士道使武士在嗜杀尚武的同时讲究仁义忠孝，举止儒雅，从而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像中国文人那样弱不禁风，反而固化了嗜杀之性，变得更加酷虐凶残。日本史书称之为“屠儿”、“屠类”。<sup>①</sup>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揭露，封建武士甚至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所以，比较而言，中国儒生重文弃武，讲求温文尔雅；欧洲骑士则执锐披坚，专事战伐；而日本武士，介乎二者之间，同具二者之性，具有文质彬彬与凶残杀手的双重性格。

武士阶级在中世纪的日本社会，为四民之首。武士阶级的统治与武士道的作用，为日本的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尚武烙印。

1868年，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从此欧风美雨润透了扶桑诸岛。士农工商的阶级秩序被废除，四民平等与“人权齐一”成为时尚口号。通过“秩禄处分”，武士阶级失去了世袭俸禄的经济基础；又通过废除佩刀，剃除蓄发，武士阶级的外在标志也被取消。庞大的武士阶级从此转入了制造、商业等各个行业，作为历史上的专职“治人者”阶级从整体上消失了。但是，武士阶级在社会文化伦理诸方面的烙印仍然存在，武士道的精神由新的统治阶级明确肯定并大力倡导。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发《军人谕旨》，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如股肱，汝等依朕为头脑……”要求全体军人遵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

---

<sup>①</sup>（日）日本历史学会编：《日本历史》，（日）吉川弘文馆，1991年2月号，第82页。

武士道要义。<sup>①</sup>由明治维新而建立的日本近代国家军队，在头脑中却灌入武士道这样沉重的铅汁，被造就为半封建半近代化的战争机器。1912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沐皇恩”的乃木大将夫妇在家中剖腹殉死。在20世纪的日本军队中出现如此封建之举，可见武士道传统影响之深。



图1 天皇颁布《军人敕谕》

一、軍人は忠節を尽すを本分とすへし  
 一、軍人は礼儀を正しくすへし  
 一、軍人は武勇を尚ふへし  
 一、軍人は信義を重んずへし  
 一、軍人は質素を旨とすへし

图2 《军人敕谕》条文

所以，日本学者指出：“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指导性地位。”<sup>②</sup>以其特殊的封建伦理价值为日本的近现代军国主义对外战争服务。

### 近现代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

明治维新固然给日本带来了近代化，但对资源与市场的迫切需求，以及传统的武士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却使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作为岛国和小国，养兵无疑是难事，而明治政府却首先重视扩充军队。1872年12月28日，明治政府发布

① (日)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著：《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日) 朝云新闻社，1974年，第14页。

② (日) 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的育成》，(日) 时事通信社，昭和57年版，第28页。

《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sup>①</sup>

为最大可能发展军事力量，日本对国家政权机构、军队统帅与组织系统等各方面大力进行了调整与改组。1878年陆军省参谋局改组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掌管作战、用兵等军令大权，与掌管军政大权的隶属于政府的陆军省分立。初步建立了军令与军政分立的军事二元制。所谓军令大权，又称统帅大权，包括平时为发展战斗力以对敌作战为目的的计划与准备，战时军队的统帅与指挥事项，等等。所谓军政大权，即有关陆海军队的编制、兵器配备、军人教育以及纪律、礼仪、服式、卫戍等事项。<sup>②</sup>

1889年，日本颁布《明治宪法》，规定由天皇总揽军队统帅权，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有关军令事项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断之后施行。统帅权独立制与帷幄上奏权使军队在国家政权中获得独立地位，内阁丧失了兵权。1893年海军方面也建立了相应的海军军令部，最后完成了军令与军政分离的军事二元制。

明治宪政的确立，使军制方面特别是有关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军权被推到至高的地位。继而在1893年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及其下属幕僚均为陆海军现役将校军官，排除包括国务大臣在内的文官参与统帅事项，再度强化了统帅权的独立。为克服由于陆海军并立而产生的两大军种之间的摩擦，使统帅机构能更有效地运转，还规定由陆军方面的参谋总长作为大本营参谋长，筹划最高军事事宜，拟定陆海

---

① (日)松下芳男：《日本军制和政治》，(日)黑潮出版社，1960年，第25～26页。

② (日)松下芳男：《日本军制史论》下，(日)有斐阁，昭和31年，第288～290页。

军作战计划。这样，在大本营中海军军令部长只相当于参谋次长地位，改变了日本陆海军本来并立的军制，企图通过大本营体制而确立“陆主海从”序列，协调在实质上无法协调的陆海军关系。

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规定，出任内阁陆海军省的“大臣及总务长官者须由现役将官担任”<sup>①</sup>，即实行“现役武官专任制”。按该规定，大臣须由大、中将担任，总务长官（即次官）须由中、少将担任。明治初年以来，担任政府陆海军省的大臣绝大部分为武官，该规定则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这一制度。现役武官专任制的确立，再度削弱了内阁的权力，强化了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的牢固地位。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对于内阁的存废有着直接的作用。首先，在组阁之际军方如不推荐陆海军大臣入阁，内阁便只能流产；其次，军方若与现任内阁政见不一，让陆海军大臣辞职，且不再推举后继人选，即可迫使现任内阁垮台；第三，陆海军大臣可以不随同其他阁员共进退，可以继续留任下届内阁，以保证军方政策的延续性。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军部与政党或内阁的斗争中，军部始终占据着上风。



图3 1895年日军设立于  
东京日比谷的凯旋门

上述诸多法则，保证了日本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也使军事权力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急剧膨胀。从法律上说，日本陆海军武装力量直属于天皇，政府管不了军队，军部只对天皇负责。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廷政分离”，天皇无实权，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诸臣争端也只听不答，待争论大体统一才能颁下“圣谕”。因此，名义直辖于天皇的陆海军，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权

<sup>①</sup> (日)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日)有斐阁，昭和31年，第495页。

威的神圣光环中,军部成了明治宪政的“权力核”<sup>①</sup>,居于特殊的政治地位。

上述诸多军事法制的完成,造成了日本近代军事力量的迅速膨胀,使日本的近代国家体制完全军国主义化。其对内政策无不以训导民众服从战争需要为中心,对外政策唯扩张海外权益而孜孜以求。

进入本世纪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演变与发展又有了新的特色。作为维新功臣而支配军政大权的“元老”相继死去,被称为藩阀政治与元老政治的旧政治格局被新的政治力量所调整。这新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两支,一为政党,再是军部。军部作为独立的、能与政府内阁分庭抗礼,又能与政党力量相抗衡的势力集团,登上日本政治舞台,据日本专家井上清的考证,大体是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事情。何谓军部,历来有多种解释,按日本研究政军关系的专家三宅正树的解释,军部“即陆军和海军为对抗政党政治家和官僚、重臣等阶层之政治势力,并对其施加压制而登场之政治势力。军部这一用法,最初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批判与反感,频繁使用之后,则作为陆海军介入和参予政治并成为重要力量时候的、代表其存在方式的用语”<sup>②</sup>。这里所说的批判与反感,包含政党方面利用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各种“军人不干政”等差别主义原则,对军部擅权所作的抗争。军部作为社会重要政治力量的出现,则进一步造成了日本现代政治史的“二重政府”局面。在政党组阁之后,军部与政府之争在本质上即是军部与政党之争,在内容上则由军部的军事扩张路线与政党的经济扩张路线,以及政党中的民主派的反军主张等交织在一起了。军部势力集团的出现,

---

① (日)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概说》,(日)未来社,1975年,第151页。

② (日)三宅正树:《昭和史的军部和政治》(1),(日)第一法規出版社,昭和58年,第10~11页。

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及其力量进一步强化的结果。

政党反对军部的主要武器为军人不干政的差别主义，而军部则凭藉上述军国主义体制几乎处于无可动摇的地位。又由于政党方面党派林立，纷争严重，力量弱小，因而其所拥有的政治地盘逐渐被军部所蚕食，其政治主张也渐次被军部的政策所取代。军部与政党的斗争结果最终是政党的失败、军国主义的强化和军部独裁的建立。这是日本对外大规模战争最重要的政治背景。

### 近现代大陆政策的形成与膨胀

日本在实行近代化变革的同时，就步入对外扩张的道路。这亦是世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共通之处。纵观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大多是在不同形式与程度的对外扩张战争中完



图4 日军侵略台湾图

成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经济相比，存在更多的贸易、市场等问题需要解决。而且由于近代科技、工业力量在军事领域的运用，火器取代了冷兵器，战争强度极大增加，拉大了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的力量距离，这使发达国家的军事决策者敢于冒险，更为好战，增加了战争爆发的频率。所以，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多强调战争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马基雅维里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他还结合史实说：“罗马和斯巴达许多世纪都是整军经武，从而享有自由。”<sup>①</sup>亚当·斯密从经济的角度强调：“在一切技术中，战争的技术确是最

<sup>①</sup>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59页。

高尚的。”<sup>①</sup> 并认为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国家”，能够比古代更容易地宰割或控制其他落后的农业国。

如果联系到这些理论与史实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就更为清楚了。日本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步较晚，对原料与市场的需要，其迫切性超过西方任何国家，更兼本身所固有的军国主义传统，所推行扩张主义的战争，自然更为迅速、猛烈和持久。

1868年4月6日，新建不久的明治政府即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御笔信），规定日本对外扩张总方针是：“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sup>②</sup> 日本政府制定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维新政策中，富国强兵为诸策之首。何谓富国强兵？“日本军国之父”山县有朋在一份奏文中说：“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sup>③</sup> 总之，国计民生完全以军事为转轴，对外问题更以武力解决为根本手段。

1890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议会上发布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同时宣称“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sup>④</sup> 公然宣称要将邻国纳入其利益线范围之内，毫不掩饰其扩张企图。在此演说后不到20年，日本就完全吞并了朝鲜。作为政府首相的施政演说，山县的主权和利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第260页。

② 伊文成、马家骏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56页。

③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第28页。

④ （日）大山樗：《山县有朋意见书》，（日）原书房，1966年，第197～203页。



益“二线说”集中体现了日本的对外扩张总方针，标志着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性的大陆政策业已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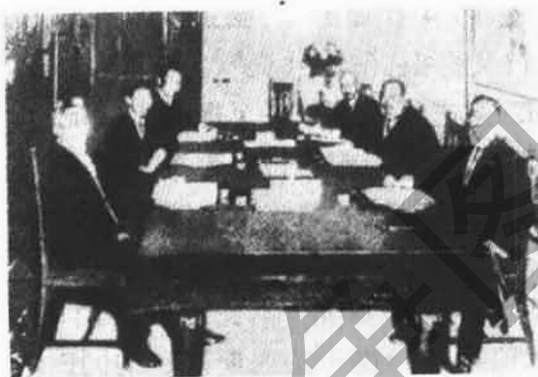


图5 对华《二十一条》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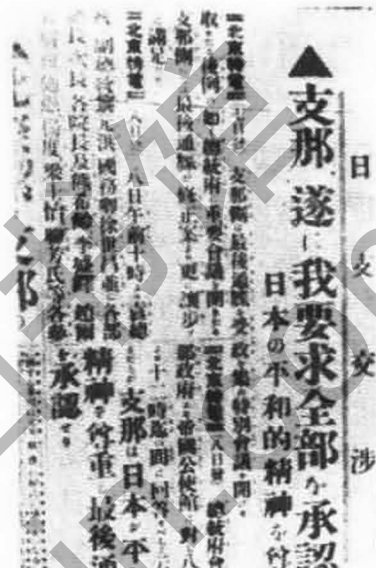


图6 《二十一条》条文

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中国便成了日本下一个侵略对象。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契机，日本的大陆政策的焦点完全转移到了中国。1914年日本出兵山东，攻占青岛并控制了整个胶济铁路。翌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廿一条”，其基本内容有：(1)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承认日本在山东的铁路修筑权；(2)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与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使用期限延长到99年；(3)由日本控制汉阳、大冶及萍乡煤铁事业；(4)中国政府宣布不将中国沿海及岛屿割让他国；(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军事和财政顾问，合办警务，等等，企图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庸国。

日本侵入山东及“廿一条”的提出，说明其势力继占领朝鲜和中国辽东等东亚边沿半岛之后，正迅速深入亚洲大陆内地。日本的

大陆政策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膨胀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战争与和平力量之间的搏斗仍在继续。《九国公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中国的国内革命亦在新的国际条件下迅速发展。国际条件特别是中国形势对日本产生的冲击，激发了日本各种社会力量进行较量。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勃兴之后，曾一度修改了军部大臣现役制，从字面上扩大到非现役的范围，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非现役的陆海军大臣。资产阶级政党还在20年代提出“产业立国”口号，同军部的武力扩张方针有所不同；又提出“币原外交”，主张按《九国公约》等国际条约协调对华政策。激进的民主派甚至提议废除统帅权独立原则，从根本上消除军部擅权，但未能出台便夭折了。

20年代，在代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政党政治迅速发展的同时，法西斯主义势力也随之崛起。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最有力的推动势力。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抛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在鼓吹对日本国内政治进行法西斯改造的同时，强调日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存在巨大矛盾，因为日本领土只是几个“散粟般”大小的岛子，“数年后即使土地有多大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sup>①</sup> 所以必须夺取中国的满蒙、苏联远东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地域，扩大帝国空间“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sup>②</sup> 来自军方的法西斯势力还强调在国内进行法西斯主义的“昭和维新”，以“满蒙问题为主要着眼点”。<sup>③</sup> 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理论为日本大陆政策增加了新的内容。

作为民主派并主张同国际协调的政党势力终于未能斗胜军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决定了日本几十年来的对外战争

---

① (日)《北一辉著作集》(2)，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73页。

② (日)《北一辉著作集》(2)，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23页。

③ (日)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日)原书房，1971年，第58页。

的根本方向,而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发展及其战争要求,又使日本近代大陆政策恶性膨胀,强化了军国主义的扩张方针,终于促成了1927年“东方会议”的召开和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及干涉东北易帜等一系列对华战争挑衅事件,并发展为全面的侵华战争。

## 2. 国防方针与对华作战计划

### 国防方针的制订

日本在其近代化的起步阶段即推行对外扩张,从刀尖上舔血吃。1874年侵台战争,日本从清廷手中勒索赔款50万两白银。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3亿两(内含0.3亿两赎辽费),相当于1894年中国岁入0.89亿两的2.5倍,折合日元为3.6亿元,相当于1894年日本岁入0.8亿元的4.5倍。1900年日本伙同列强干涉中国义和团运动,又迫中国交付“庚子赔款”,日本从中获得约3479万两巨款。战争赔款滋养了这个东亚的小岛国,特别是《马关条约》巨额赔款使日本的产业革命得以飞跃发展,促成其资本主义工业化基本确立。藉此,日本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沙俄。日本军国主义就像滚雪球,势力越滚越大,成为亚洲第一军事强国,并跻身世界性军事大国之列。



图7 《帝国国防方针案》条文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由于连年用兵,国内疲惫,财源枯竭,日本

政府正被迫对财政施行收缩整顿。而对外军事方面,对中国等大陆国家的扩张目标尚未完成,美、英、德列强在东亚拥有巨大的殖民利益,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日竞争激烈。特别是俄国,虽败于日本,但它仍拥有日本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战争潜力,日本始终担心俄国进行报复战争。故日清、日俄两大战争之后,日本最高统帅部的神经仍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他们一方面要对付中国、俄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的反抗与报复,另一方面又欲借战胜之势,进一步扩张军事力量,保持其世界帝国地位。

因此,日本军国主义以更为庞大的侵略目标,更为迫切的扩张欲望,对其世界战略进行了新的规划。1906年10月,山县有朋上奏提出陆军方面的《帝国国防方针案》。年底,陆海军在此基础上又共同起草了《帝国国防方针》。翌年4月4日天皇正式批准了《帝国国防方针》及其附件《国防所需兵力》以及《帝国军队用兵纲领》。其要点有:

甲、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

乙、未来之假想敌国,当以俄国为首,次为美、德、法等诸国;

丙、国防所需帝国之军备标准,当以能在东亚发动攻势,以对付在用兵上最应重视的俄美兵力为限度。<sup>①</sup>

日本军部极为重视该“方针”等3个文件。山县有朋曾代表元帅府上奏说:“帝国国防方针适应了内外形势,合于日本国是,随其而定的国防所需兵力及帝国军队用兵纲领照顾到了我国的财政,是能很好寻求保护帝国利益之道的至善之策案。”换言之,《帝国国防方针》等文件的制定,确定了日本进攻型的世界战略,成为其后来参与并发动世界性战争的根本性指导方针。

---

<sup>①</sup>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日)朝云新闻社,昭和54年,第60页。

## 国防方针的两次修改及其主要内容

日本人民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付出了“血税”，而发战争财的却是少数垄断财阀、政商及大权在握的军政官僚。因此，人民的反战浪潮持续高涨，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平民新闻》等刊物大量刊登反战文章。内阁政府亦困于财政经济危机，对军部的穷兵黷武时表示不满。

但是，军部却继续独行其是，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在朝设置武官总督，对其实施军事殖民统治。翌年7日，军部提出了一份新的扩充军备计划，要求内阁增加两个师团预算，海军方面要求增加造舰经费。这一扩军要求同当时的西园寺内阁整顿财政方针发生抵触。于是，军部使用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法宝，让陆相辞职，并不派继任者，迫西园寺内阁辞职。军部的蛮横做法立即招致了政治混乱，各界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反对军部的专横与暴政，形成以民主护宪和反军为主流的规模浩大的“第一次大正民主运动”。军部的扩军计划暂时受挫。

但是军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挫败了民主派与反战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控制了中国的山东半岛，随之提出对华“廿一条”，军部的扩军提案也终于在1915年5月得以通过。1917年日本乘取道海参崴归国的捷克兵团发生兵变之机，派兵侵入苏联远东地区，使用兵力最高时达25万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军国主义获得了一次日方自称的“天佑良机”，势力飞速膨胀。

为指导进行新形势下的对外扩张，1918年6月“国防方针”等文件被第一次修改。其修改宗旨主要是，重新确立了主要假想敌国的排列。以俄、美、中为序，中国作为日本假想敌国的位置显著提前。在用兵纲领等文件的补充规定中，还确定了对华作战兵力。陆军计划编成40个师团，海军应建造以主力舰24艘和相应辅助舰只的骨干舰队，掀起新的扩军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美国势力大增,并欲遏制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势头,通过制定对华《九国公约》及缔结国际裁军协定,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压力,日美两国摩擦加剧。在中国方面,随着日本的势力不断侵入,民族爱国热情持续增长,先后爆发了1919年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大规模爱国运动。为此,1923年日本对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以摆脱国际压力,达成既定扩张目标。这次修改的基本宗旨是:“自今之后帝国国防要以同我发生冲突之可能性最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军备之美国为目标,重点予以防备;对同我接壤的中俄两国,以亲善为宗旨,力求为我所用,同时始终保持震慑它们的实力。”<sup>①</sup>在用兵纲领中则仍以美、俄、中的次序制定了作战计划,中国已成为第二主要假想敌国。日本制定了比第一次修改时更为详尽的对华作战计划。

日本对“国防方针”等文件的修改,揭示了日本世界战略的运行轨迹,它反映在对华战略方面则在于完成并改进了进攻性的军事战略,补充并发展了大陆政策。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侵华战争,并在侵华战争期间于1936年对该方针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因此,第二次修改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特别值得重视的内容有如下几点:

首先,“国防方针”一如过去强调:“一旦有缓急当采取攻势作战在我领土之外击破敌人。”同时在“用兵纲领”中补充:“帝国军队作战应根据国防方针,协同陆海军,争取先制之利,以采取攻势为宗旨。”<sup>②</sup>这一规定加固了日本的进攻型战略,其影响不止在于军事领域,且对外交等政略问题也带来了极大影响。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九一八事件”,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其方针盖源于此。

---

① (日)《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93页。

② (日)《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94~95页。

其次,关于假想敌问题,将原俄、美、中序位,调整为美、俄、中。或强调以美为主,震慑中俄。中国在日本假想敌国中的序位,每次修改都有所提前。之所以在字面上暂时还被放在美、俄之后,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兵力弱小,没有对外扩张野心,对日不构成威胁。而实际上,中国始终是日本所认定的首要的攻击目标。即使是对美对俄作战,也必须要先征服中国,以获得战争资源和作战基地,壮大战争能力。所以,日军统帅部在制定对美俄作战计划的同时,必定要拟定相关联的对华作战草案。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矛头,始终指向中国。

第三,关于对多国作战问题。在这次修改条文中,一方面承认从日本国情看,对多国同时作战是不可能获胜的,但仍强调要作好对多国作战的准备。这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性与冒险性。后来日本肆无忌惮地不断扩大战争范围,把战火烧遍了整个东半球,其指导原则亦在于此。

### 对华作战计划

在上述大政方针指引之下,日本的侵华战争作战计划,筹谋甚早。1923年2月在第二次修改国防方针时,已提出了全面对华作战的计划,准备从北向南多方向发动进攻,其主要攻击地点有三:东北地区,应加以全面控制,其中北满地区还应兼顾对苏作战任务;华北地区,必要时实施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登陆作战,占领河北、山东等要地;华东地区,选定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为登陆点,作战范围视情况而定;其余在浙、粤等东南、华南方向的作战亦视情况而定。这一计划比较粗略,但意图十分明确,要求届时根据行使武力的动机、中国政情、第三国态度等多种因素而确定具体作战行动,强调“计划的具体部分应尽量减少,更多的应该临机决定”。<sup>①</sup>

---

<sup>①</sup>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

到了1925年,针对中国国内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北伐即将开始的情况,日本制定出1926年度作战计划,即《大正十五年度作战计划》,提出了更为详尽的对华作战计划。该计划所要求的技术标准甚高,强调制定后能在实战中发挥指导作用,还提出“对中、对俄、对美三个作战无论以什么顺序或无论以什么间隔开始,都能无障碍地实施”。<sup>①</sup>此即表明,日本已正式将中国列为首要假想敌,这是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巨大变化。在兵力部署方面亦将重心放在中国,计划动员兵力32个师团,其中用于对美作战兵力陆军为3个师团又1个支队,对苏作战兵力13个师团又1个支队,对华作战16个师团,所占比例分别为对美9%,对苏41%,对华50%。<sup>②</sup>需要指出的是,对苏作战的兵力大部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这样实际上侵入中国的兵力将大大超过上述比例。

该计划还将对华作战的三大战场再度作了明确规定。东北地区,作战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洲,要将间岛(今延边部分地区)地域及南满铁路沿线以及嫩江以南之旧洮线、渤海湾沿岸地区作为第一阶段作战范围;在华北方面,要准备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以足够兵力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该方向计划兵力为7个师团,约占对华总兵力的31%;在华东方向(日军称为华中方向),要在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点,在此方向作战及其实施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此外,在浙、闽及华南各地,也应以当时具体形势临机处置。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日军作战计划已经准备攻占中国心脏地区汉口,从军事上全面占领中国。计划“以(华北)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扬子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在汉口附近地区作战”。<sup>③</sup>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01页。

② 据(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01~302页数字计算。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



为此,日军于当年立即着手准备,派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畑俊六大佐率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下属分管作战、要塞、船舶等方面官员,乘军舰自上海溯江而上,进抵汉口,公开进行全面的作战侦察,历时一个多月。约13年后,出任日本华东派遣军司令官,直接指挥对汉口的攻占的,正是这位已晋升为大将的畑俊六。

1926年度作战计划确定了后来的侵华战争的基本方向,成为后历年作战计划的蓝本。日本上述作战计划的炮制,充分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计划性、全面性。

### 3. 军队、装备、技术及其战略特征

#### 军事战略的根源与特征

1868年明治维新后组建的日本近代武装力量,曾先后仿效英国、法国等海陆军强国,最后以德国为模本。1885年至1888年间日本聘请德国军事教官迈克尔(Klemens Wilhelm Jakob Meekel)等人到日本陆军大学任教,培训日本高级军官,并具体参与和指导了日本的军事改革。日本的军事制度以及强调“速决”、“攻势”的战略战术,基本上来源于德国。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包括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1915年的对德作战、1917年入侵西伯利亚等,取得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这些战略战术原则不仅贯穿在上述“国防方针”、“用兵纲领”以及各种作战计划之内,而且更表现在各次战争的实际推行之中。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军继续遵循运用了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其基本内容和特征有:

第一,强调攻击原则。先发制人,攻势作战,这既是日军的传统,也是德国教练迈克尔的基本教义。日本在有关战争指导方面强

调攻击原则,在战役战术方面亦重视攻击原则。因此,日本总是频繁地发动新的战争,不断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行持续不断的进攻性作战,纵然形势不利也力求进攻或以攻为守。攻击原则,是日军战略战术上的根本法则。

第二,强调“相机处置”原则。日本的军事行动,总有极为周密的计划安排。但另一方面,日军在军事行动上又极富有应变性特征,即强调“相机处置”原则。在1923年第二次修改其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以及1925年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等文件中,都明文规定日军行动将依情况而“临机处置”。1936年,日本已经割占了中国东北及长城要隘,实现了第一阶段对华作战目标,在对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进行第三次修改时,仍然强调“视作战进况,或参考外交关系,以必要的兵力攻占政略上的要地”准备攻占关内要地。<sup>①</sup> 日军相机处置原则既是其特点,也是其弱点。日本在军制上实行国务与统帅权分离原则,政略与战略难于统一,陆海军并立直属于天皇,时常产生摩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一批以陆大毕业生为中心的、被称为“天保钱组”<sup>②</sup> 的新兴军阀势力,他们控制军部要职,时常自行其是,形成严重的“下剋上”现象。而临机处置原则,给这些新兴军阀或现地指挥官于战场随意变更或超越用兵界限提供了依据,这在整个15年侵华战争中都屡见不鲜。

第三,强调速战速决。受传统和德国教练迈克尔的影响,日军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强调“速战速决”、“初战必胜”、“争取先机”等战略战术原则。它们在日军的作战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需要指出,日军在强调速战速决的另一方面是忽视了持久战的作用。1923年,日本在对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进行第二次修改时,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准备进行长期持久战争。在

---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95页。

② 陆大校徽与日本江户时期天保年间一种货币相像,故此得名。

后来的侵华战争中特别是武汉会战后,曾提出持久战略。但总的来说,日本持久战略是不彻底的。原因之一,乃是作为岛国,在资源和人力方面,都难于坚持长久的对外战争。再是由迈克尔指导的日本陆军大学教育“缺乏指导持久战争的基础知识”,结果是造成日军作战指挥机关“不能指导持久战争”。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评论道:能胜任对中国长期持久战争进行综合指导者“参谋本部中尚无一人”<sup>①</sup>。

第四,强调攻占要地。日军重视攻势作战,擅长突然袭击,其作战多以攻占要地为主要目的,由此而经常将歼灭对方有生力量放置相对次要的位置。在战场狭小规模有限的战争中,这样的战法可能是有效的,但要对中国这样人口多地盘大的国家进行长期战争,这样的办法就很难奏效了。对境外殖民权益的拼命追求,乃是日军强调这种战法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日军这一战略弱点是难以克服的。

#### 近现代军制沿革与军事教育概要

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幕藩时代,日本没有统一的国家军队。其政治体制同秦汉以后中国郡县制有很大区别,作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执政者——征夷大将军,实质为一最大领主,凭藉其相对强大的经济势力与军事力量,君临各藩国。藩的数量在江户时期(1603~1867)约250~300家。<sup>②</sup>各藩力量大小不等,少数强藩兵力甚至可以多达数万人,虽不敌幕府的直属部队“旗本八万骑”,却也是一支可畏的武装力量。明治维新期间,改革派推翻幕府取得成功,西南各强藩的军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治政权建立之后,1870年10月,兵部省颁布了统一兵制的布告,要求各藩统一“海军以英吉利式,陆军以法兰西式”进行改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61页。

② 伊文成、马家骏等:《明治维新史》,第67页。

革。1871年4月,从改革派强藩长州、萨摩、土佐三藩各抽调1万藩兵,组成以拱卫京师、保护天皇为主要任务,直属于天皇的“御亲兵”,翌年改称近卫兵,这是日本近代国家军队的雏形。

随着明治政府各项维新政策的推进,1871年“废藩置县”,拥兵割据的各藩国不再存在。随后逐步推进“秩禄处分”,颁布了1872年的《枪炮取缔令》、1876年的《废刀令》,从根本上消灭了武士阶级。年底又颁布《征兵令》、《太政官告谕》,“让四民渐获自由之权”,并本着“上下平均、人权齐一之道”,使各阶层均成为平等(形式上)的皇国之民,同样担负兵役,为国贡献“血税”。<sup>①</sup>新的征兵办法打破了藩属界限,直接按新的国家行政系统从民间征召“忠直良顺之人”。上述改革措施使军事权力不再为武士阶级所专有,近代国家常备军随之建立。首批新兵于1873年入营。全国共建6个镇台(军管区),负责征兵事宜并编组新军,每镇台下分2至3个营所(师管区),全国共6镇台14营所。1873年计划平时兵力3.1万,战时兵力4.6万余。<sup>②</sup>

日本的近代军事改革,遭到旧武士阶级的反对;同时,由于新政府实行全民皆兵,征调“血税”,普通民众也感到严重不安。1876年,终于爆发了最大的一次内战,萨摩地区旧士族举行反政府叛乱,并拥立明治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为首领,叛军达3.3万余人。政府调动新建的陆军9个旅团,加上熊本镇台守军共5.4万余人,进行讨伐。萨摩武士虽然骁勇善战,但在一支真正的近代军队面前,这些以刀剑为主要武器的士族军队很快就被完全击败,西乡本人亦自杀身死。这场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内战,正好是新旧军事力量的较量与检验,日本的近代军事改革取得了初步成功。

鉴于1871年普法战争中德国取得全胜,日军转而完全以德国

---

① (日)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上,第240~241页。

② (日)《帝国陆军编制总览》,(日)芙蓉书房,昭和62年版,第12页。

军队为样板继续进行军事改革。1886年设置“陆军临时制度审议委员会”，聘请来的德国军事教官迈克尔也是委员之一。无论是国家军事制度，还是军校中对军官的教育，均以德国军队为楷模。1888年，日本正式废除镇台制，制定了新的《师团司令部条例》、《旅团司令部条例》等，实行新的以师团制为中心的序列编制。以原6个镇台编为6个师团（近卫军于1891年编成近卫师团），主官称师团长。每师团下辖二个步兵旅团，每旅团下辖二步兵联队，另配属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等部队。明治时期，每师团兵力平时定员约9189人，战时可扩充2至3倍。1890年全国军队定员计划为6.7万人。<sup>①</sup>

师团是日本军队平时序列的最高单位，也是日军的基本战略单位。师团长直属天皇，中将衔，师团制沿用了几十年，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战争规模急剧变化，在师团之上编成的军、方面军、总军等战略建制单位日益增多，师团的战略地位、隶属关系、兵力编成等各方面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

国内甫定，日本立即将矛头转向国外。1880年山县有朋炮制《邻邦兵备略》，鼓吹以中国为对手，尽快扩充军备，大幅度扩编步、骑、炮、工、辎重等特殊兵种。其军费支出1883年占国家岁出的13%，1887年上升为16%。<sup>②</sup>1889年2月，日本在颁布《明治宪法》的同时，重新发布征兵令，规定：“凡日本帝国臣民年满17岁至40岁的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sup>③</sup>兵役共有如下几种形式：常备兵役（现役3年、海军4年，预备役4年4月、海军3年4月）、后备兵役（常备兵役后5年）以及补充役等。新颁兵役制延长了服役时间，扩大了兵役范围。对缓征的范围和时间

---

①（日）《帝国陆军编制总览》，第28页。

②（日）《帝国陆军编制总览》，第26页。

③（日）《帝国陆军编制总览》，第28～29页。

作了极严格限制，并停止了以前实行的对师范学校教员的缓征规定，为其重新制定6周现役制。其目的之一是使教师体验军事教育，以便能身体力行，在中小学生中进行军事教育。按新的征兵令，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必须服上一次以上的兵役。其后兵役法经过多次修改，除年限略有增减外，基本宗旨相同。依靠这种广泛的近乎强制的法律手段，日本军国主义最大限度地扩充了兵源，从而使日本人民承担了世界上最为广泛、严厉而沉重的“血税”义务。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每隔5至10年左右便要进行一次对外侵略战争，而每一次战争都会带来新一轮的扩军计划。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陆军计划将建军初期7个师团扩至13个师团；1907年“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计划扩军，平时为25个师团，战时为野战师团25个、预备役师团25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炮兵旅6个及其他山炮、重炮兵等部队。到1923年第二次修改“国防方针”时，根据“精兵主义”原则，计划开战时陆军兵力应达40个师团，并将原有18个师团精简为14个师团。全面侵华战争后的1938年，日军动员兵力24个师团，兵力动员累计73万人（若干独立混成旅团不计）。1940年已扩军到49个师团。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日军总兵力已达51个师团，227万人。1944年底据日方统计数，日军已扩充到99个师团，现役407.9万（含应召新兵260万），此外还有在乡军人待招的585.5万。到停战投降时兵力总数为168个师团，547万人。<sup>①</sup>兵力发展达日本历史上军备之顶峰，其膨胀速度在世界战争史上亦为少见。

军官是军队的骨架，了解日本军官的培育与构成情况，对于认识日本侵华战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日军历来重视以正规军校培训军官，士兵原则上不能直接提拔为军官，只有先取得“干部候

---

<sup>①</sup> 见（日）《帝国陆军编制总览》，第46页。

补生”资格,再经军校培训后才能授予官衔。早在幕末时期,日本就开办了各式仿西洋的军事学校。明治政府建立后,开办了大阪兵学校,分设步、骑、炮等各种学科。1874年颁陆军士官学校条例,在东京创办士官学校,并于1874年正式招生。1878年陆军士官学校新校建成,开校典礼上,皇族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代表天皇宣布了敕语:“朕以为,兵之强弱,取决于士官是否精良。此乃设置该校之缘故也。”<sup>①</sup>士官学校是日本军校的骨干力量。

日本军事教育的基础成份是少年教育。1898年正式设立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和地方幼年学校6所。招收的对象是从中学选拔来的十三四岁左右的少年,将皇族子弟和来自贫寒家庭的平民子弟混合编班,课程除普通中学教学内容之外,还设置了大量军事知识,并实行极严格的军营管理制度,以培养学生的忠于皇国的所谓“高尚优美气质”,“忠勇节义志操”,并自幼便养成理想的“军纪风纪习惯”。<sup>②</sup>陆幼学生毕业后再进入陆士深造。所以实质上陆幼又是陆士的预备学校。如此大规模地、连续地实施少年军事教育,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并不多见。

高踞军事教育顶端的为陆军大学校,它成立于1883年。德国军官迈克尔于1885至1888年受聘为军事教官后,在教学管理体系及内容方面都有很大变化。1885年第一期10名学生毕业。陆大学生原则上以各兵种中少尉军官的优秀者经考试后录取,学制3年。毕业后,就可以取得担任军事要职、晋升将官的通行证。他们逐渐在日本军队中占领了核心职位: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陆大生还不过处于上尉或少佐军阶,担任军或师团中的下级参谋;到日俄战争时期,军总参谋长以下各级参谋,几乎全是陆大毕业生;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陆大毕业生则掌握了军内各种要职,形成了不同

---

① (日)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第110页。

② (日)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第110页。

于藩阀的“陆大阀”，控制了军部大权。

在明治末年，日本的军事教育体系已基本完备，于是在陆军中构成了由陆幼——陆士——陆大的梯级教育。此外还有各专业兵种的陆军炮兵学校、陆军骑兵学校、陆军野战炮兵射击学校、陆军重炮兵射击学校、陆军经理（后勤）学校、陆军兽医学校、宪兵练习所等等。

日本军事教育体系的发展，其本身是日本近代职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日本近代官僚体制发展的一个方面。但受日本在近代化发展与转轨期间的特殊历史与社会条件的制约，它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力量的温床，是运转其战争机器的能源动力。如此庞大的军事教育体系造就了一批嗜杀黷武的战争狂人，他们直接将日本人民驱上战场，给东亚各国人民造成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灾难。

### 装备、技术概况与比较

早在19世纪初，幕府及各藩政府已经引进西式武器及其生产设备。明治政府建立后，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军火工业自然被摆放到首要位置。而这一时期恰值西方武器大换代，后膛装弹并有来复线的步枪大批生产，钢炮亦取代了青铜炮。这极大地便利了锐意于近代化改革的日本，使它能够直接吸收西方军火生产最先进技术，装备了当时世界最新式武器。

1880年，村田经芳少佐通过在欧洲的考察，设计出了“一三式村田步枪”，经过进一步改进，减轻重量以符合日本人体格，到1886年日军生产并全部装备了“一八式步枪”。这是日军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使用的最基本的单兵武器。在侵华战争中步兵使用的“三八式步枪”，亦是由这种步枪改进而来。火炮方面，日本也迅速赶上了世界潮流，1883年开始制造后膛装钢炮，告别了青铜前膛炮时代。

1908年在陆军省下设兵器局，负责武器的研制、装备等事务。1911年日本的军用飞机试飞成功，随即用于实践。1914年日本进



攻德国在远东的基地青岛,即编有临时航空队,担任侦察、轰炸等任务,并以海军的“若宫”舰为母舰,载4架水上飞机参战。而美国是1913年才有一个装备8架双翼的柯蒂斯型飞机的航空中队,1916年派到墨西哥执行侦察与通讯任务。<sup>①</sup>于此可见日本对航空武器的使用,一直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

1919年日本正式设立陆军航空部,组建航空队、气球队以及陆军航空学校、陆军工兵学校。1920年内阁设航空局,归陆军大臣管理,1923年移属递信省,此外又在东京帝国大学办航空研究所。为协调陆海军各自所属的空中力量,1920年建立航空协定委员会,并于1920年12月2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在联络通讯技术方面,1904年2月日本陆军设置“无线电信委员”,1925年还建立通信学校,在各部队配备专门的电信人员。

汽车在军事中的运用也很早。1907年陆军技术审查部在德、法国展开汽车生产和使用技术调查活动,1912年设置军用汽车调查委员。1914年日军进攻青岛时已将汽车配属部队用于炮弹运输。1925年还建立了陆军汽车学校。

为不断改进装备与技术,除不断增加拨款外,1918年还在各军、师团单位内设置兵器部。1919年废原陆军技术审查部,新设陆军技术本部,此外还设置了“陆军技术会议”、“陆军科学研究所”等机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各国开始裁军。迫于形势,日本先后进行了1922年的“山梨裁军”,裁员59464名、马13000头;1924年推行“宇垣裁军”,裁员33894名、马6089头。<sup>②</sup>两次裁军汰员后节省的资金都

---

<sup>①</sup> (美)阿伦·米列特、彼得·马斯洛斯基:《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页。

<sup>②</sup> (日)《帝国陆军编制总览》,第53页。

全部转用于新式武器的研制与装备,裁军活动实际成为日本推行“精兵主义”政策的绝好机会。

日军一方面裁汰冗员,一方面新设特种兵部队,裁军期新设的有:第一坦克队,高射炮第一联队,飞行第七、第八联队以及山炮兵大队,陆军通信学校,汽车学校等。在人员方面,各级军校以“少量”、“精锐”为原则,暂时减少招生量,提高教育质量。为保存军事骨干人员,1925年开始将裁减的约2000名军官配置全国中学以上学校,充当军事教练。这些教练一旦有战事便可重新入伍,保护了军官队伍;这些军官配备于学校,还加强了对民众的军事影响,扩大了全民皆兵基础;受训学生今后应征入伍,可以缩短新兵训练时间,及时补充战斗部队,可谓是“一石三鸟”。此外,日本政府还在市、町、村建立青年训练所,凡16至20岁男子均须集中受训。据统计,自1926年起全国共建训练所15930个,训练青年955990人,<sup>①</sup>大体相当于1938年全面进攻中国时的总兵力。

在精兵主义与发展新式兵器的宗旨下,日军装备不断改良,技术不断发展,军事力量飞速提高。到侵华战争开始后的1933年,陆军计有作战飞机1200架(含补充飞机600架),坦克150辆,高射炮150门,此外还有大量的化学、生物细菌武器。<sup>②</sup>根据陆军省1933年秋的统计,以师团为单位,日本同欧美军事大国相比,力量相差不多,见27页表。

如与中国军队的装备相比较,则高出一大截。中国军队的编制,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由国民政府确定,全国共设编步兵65个师、骑兵8旅、炮兵16团、工兵8团,总额约80万人。国民党意在削除异己兵力,而各派军阀又自行其是,任意扩军。该计划未能执行。按设计,国民政府军制以日军为

---

① (日)《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115页。

② (日)《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129—130页。

列强陆军野战师团装备比较表<sup>①</sup>

| 数<br>量<br>装<br>备 | 国<br>别 | 日     | 苏     | 美                | 英         | 法      |
|------------------|--------|-------|-------|------------------|-----------|--------|
| 轻 机 枪            |        | 约 300 | 约 186 | 自动步枪<br>约 1000   | 318       | 324    |
| 重 机 枪            |        | 约 50  | 162   | 约 200<br>高射约 200 | 204 高射 28 | 144    |
| 平射步兵炮            |        | 约 10  | 9     | 42               | ?         | 9      |
| 曲射步兵炮            |        | 15    | 9     | 32               | ?         | 18     |
| 野 炮              |        | 35    | 36    | 48               | 54 榴弹炮 12 | 最小限 42 |
| 野战重炮             |        |       | 12    | 24               |           |        |
| 飞 机              |        |       |       | 13               |           |        |
| 轻型坦克             |        |       |       | 24               |           |        |

范本,以师为平时最高单位,步兵每师辖 2 旅 4 团,但所配特种兵无论数量或火力均远远不及日本。1932 年,国民政府恢复军事委员会制度,重新编全国军队为 48 个军 96 个师,师配工兵、辎重、通信等特种兵营。但各派军阀仍然纷争暗斗,未能统一,重武器固然严重缺乏,人员亦多缺额。师属炮兵营大多只有 4 门 75 毫米炮,火力远不能和日军比较。据日军史书记载,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 1891 年,日军所颁《步兵操典》规定的基本战术,就是在 75 毫米炮的火力支援下,步兵以疏散队形突击前进。<sup>②</sup> 中国工业落后,1930 年全国钢产量仅 1.5 万吨。<sup>③</sup> 20 年代中国曾试产汽车和组装飞机。

① (日)《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 129 页。

② (日)《帝国陆军编制总览》,第 31 页。

③ 《中国昨天与今天》,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第 246 页。

军火生产最大工厂在沈阳，“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掳去。中国只能自产一些轻武器如步枪和部分火炮等，重武器和大批弹药全靠进口。海空力量完全不能和日本匹敌。1937年，国民政府再度整理军队编制，按新编装备与兵员比较，差别仍然极为悬殊，见下表：<sup>①</sup>

日本师团与华军师编制装备比较表

| 编<br>制<br>比<br>较 | 兵种  | 日军             | 华军             | 备<br>考 | 类别        | 日军     | 华军     | 备<br>考               |
|------------------|-----|----------------|----------------|--------|-----------|--------|--------|----------------------|
|                  |     |                |                |        | 人员        | 21945人 | 10923人 |                      |
|                  | 步兵  | 旅三<br>(团四)     | 旅二<br>(团四)     |        | 马匹        | 5849匹  |        |                      |
|                  |     |                |                |        | 步骑<br>手枪  | 9476枝  | 3821枝  |                      |
|                  | 炮兵  | 团一             | 营一             |        | 掷弹筒       | 576枝   | 243枝   |                      |
|                  |     |                |                |        | 轻机枪       | 541挺   | 274挺   |                      |
|                  | 骑兵  | 团一             |                |        | 重机枪       | 104挺   | 54挺    |                      |
|                  |     |                |                |        | 榴弹野<br>山炮 | 64门    | 16门    |                      |
|                  | 工兵  | 团一             | 营一             |        | 团营炮       | 44门    | 30门    |                      |
|                  | 辎重兵 | 团一             | 营一             |        | 战车        | 24辆    |        |                      |
| 装<br>备<br>比<br>较 |     |                |                |        | 车辆        | 262辆   |        | 系日炮兵<br>团之配备         |
|                  | 战车  | 连一             |                |        | 自动<br>货车  | 266辆   |        | 全数均系<br>日辎重兵<br>团之装备 |
|                  | 其他  | 特种<br>部队若<br>干 | 特种<br>部队若<br>干 |        | 一马<br>曳车  | 555辆   |        | 全数系日<br>辎重兵团<br>之装备  |

① 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118页。

自 19 世纪末清廷在天津编练“新军”开始,中国才算有了装备新式武器及其相应组织形式的近代武装力量,这比起日本已经落后了二三十年。而在兵役征召、组织管理、指导思想、军事素质等诸方面尤为落后。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社会混乱,各地军阀争相发展各自的武装,但没能使国家的军事力量取得更多的发展。从兵役法来说,日本依靠其军国主义体制,完全解决了兵役动员问题,可以在战时迅速征集到数百万兵员。而中国是各部队各自募兵。1937 年之后,改行征兵制,并在中央军政部下设兵役署,负责征兵和军队训练。但由于政治分裂,社会混乱,征兵制不能有效推行,民众躲避兵役,甚至出现强拉“壮丁”的现象。因此,中国人口众多,却没有可靠和有效的兵源渠道,这严重约束着对日作战的战斗力。至于军队,国民政府军队成军于北伐时期,由收编各军阀或地方部队而发展,内部以腐化著称,打骂士兵、贪污受贿、长官吃兵员空额薪饷等现象十分普遍。一遇战事,长官经常避战,士兵时常开小差。大部分军队战斗力低下。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恣意妄为,除其军国主义目标之外,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性,为其发动战争提供了诱惑。我们分析日军侵华战略问题,亦不能忽略力量不平衡这一重要问题。

#### 4. 中日关系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 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日本的大陆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中国的扩张侵略政策,而本世纪 20 年代,日本国内问题急剧变化,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进一步加快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步伐。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得到巨额战争赔款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进而于本世纪初实现了工业化。例如甲午战争之

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 6785 万元,战后的 1897 年便增长为 53252 万元,增长近 7 倍。<sup>①</sup>又如 1914 年日本黄金储备还只 34100 万元,1920 年便增长为 219800 万元,增长 5 倍多。1912 年前日本负有 19 亿元债务,一战后不但全部偿清,而且成为拥有 277000 万元的债权国。<sup>②</sup>但是,日本经济依靠从刀尖上舔血吃,本质十分虚弱,其重工业虽然高速畸形发展,基础工业却相对落后。农村中仍以寄生地主制为主体,生产力很低,破产农民不断增加。

日本的经济问题是导致对外战争的基本动力之一,也是造成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农村的贫困问题,破产农民为军队增加了兵源,同时也就加强了军队对农村的关注。军内的各种团体组织,无不以“救济农村”为基本口号,30 年代中期更成为皇道派、统制派法西斯少壮军人打击政党内阁的政治武器。1923 年 9 月 1 日,东京地区发生 7.9 级大地震,死伤失踪共达 246531 人,房屋毁坏共 701627 间,受灾人数达 340 万。<sup>③</sup>震灾不但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还给脆弱的以战争经济为基础的日本社会带来一系列危机。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发生了 1926 年金融危机,大批银行倒闭,社会受到巨大震荡。

日本经济借助战争掠夺起家,严重依赖海外殖民利益,故不能不受海外国家的政局变化的影响。例如 1926 年中国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输出由 1925 年的 4.85 亿元降低到 4.21 亿元,减少约 12.5%。<sup>④</sup>1927 年 3 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股票市场暴跌,4 月 3 日在汉口发生日本陆战队挑衅并与中国民众冲突事件,日本股票跌落更甚,并导致日本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有名的台湾

① (日)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青木书店,1955 年,第 100 页。

② (日)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年,第 186~187 页。

③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 1 卷,中译本,第 174 页。

④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第 518 页。

银行也濒临破产。这次危机使日本银行停业31家,总资金达17845万元,而前一年日本的贮蓄存款总额不过77563万元。<sup>①</sup>

经济危机不断增长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日本的政治危机也不断增长。在大正民主运动之后,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曾有长足发展,20年代是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鼎盛期。但随着社会经济危机的不断发展,各政党“腐败”,彼此之间角逐争斗甚烈,而法西斯主义却迅速崛起。1919年5月,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抛出日本的第一部法西斯主义纲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改名为《日本改造案大纲》),要求日本在动荡的东亚社会中,加强国家集权,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同时向外扩张,割占中国的满蒙地区、苏俄远东西伯利亚和南方的澳大利亚,建立一个让后世史家赞叹的“黄人罗马帝国”。在日本军队内部,法西斯也在滋生蔓延,明治时期法律所规定的“军人不干政”条文,并未能阻止各种法西斯性质的政治团体的不断出现。1921年,荒木贞夫、东条英机等数名少壮军官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订立盟约,决定归国后在日本推进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军内的法西斯团体主要有:1923年建立了“木曜会”,1929年有“一夕会”,1930年有“樱会”,等等。这些法西斯团体成员分布在日本军内的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教育总监本部各中枢部门,握有很大实权。军队法西斯势力掀起了新的战争叫嚣。东条英机在1928年木曜会的一次聚会上作报告时,强调要以“满蒙问题为主要着眼点”。一夕会成员、吞并中国东北的筹划者石原莞尔也鼓吹说:“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sup>②</sup>

进入30年代之后,日本军队法西斯势力发生分裂,形成为皇

---

① (日)横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版,第148页。

② (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58页。

道派与统制派。两者都主张大力进行对外扩张,特别是统制派强调以对外战争来推动国内的法西斯“昭和维新”。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都是统制派成员,他们实行并推动了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侵华战争。因此,尽管此时的法西斯势力尚未执掌政权,但日本的侵华战争的发动,本身就是法西斯势力推动的结果,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产物。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确立,得力于战争的促动,又反过来扩大并强化了对外战争,这就是日本的战争与法西斯之间的相互关系。

### 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

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的外务省召开东方会议,针对中国局势,制定对华政策。东方会议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会议由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与会者有外务省、驻华公使、驻奉天总领事,以及军部各方面要人。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首相田中宣示了《对华政策纲要》,主要内容有:

.....

五、此间由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六、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



图8 东方会议会场

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



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七、(本项不予公布)……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与发展之地而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sup>①</sup>

日本东方会议所决定的政策导致中日关系迅速恶化。

第一,它虽然是公开发表的文件,用语尽量温和,却也揭示了日本好战而强硬的对华外交路线,完全打碎了此前由政党政治提出的“经济外交”、“金元外交”及“协调外交”。

第二,更明确地公开宣布日本具有巨大的在华权益,特别强调其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力图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提供舆论准备。

第三,宣布日本将采取“断然自卫措施”及“适当措施”等各种手段,实同于战争宣言。

所以,东方会议及其决议的制定,使日本对华政策更富有侵略性和好战性,这是1915年提出对华“廿一条”以来又一重大事件。

在东京的会议结束之后,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会议由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日驻华公使、关东厅长官、驻奉天总领事以及关东军头目等参加会议。会上进一步对侵入中国东北进行了讨论和具体策划。

除上述公开发表的会议决议之外,相传田中义一会后整理了一份上奏天皇的奏折,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主要内容有:

“且东三省处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

---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76~277页。

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sup>①</sup>

田中奏折内容早于1929年12月在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日本方面当时即矢口否认。但是,在奏折披露后不到两年,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且其后侵略方向与奏折的叙述几乎一致。再者,日本决定投降之后,“在陆军中央指挥部所在地市谷高地上开始焚烧机密文件”,“由参谋本部总务科长和陆军省高级副官向全体陆军部队发下了奉谕焚烧机密文件的通知。在市谷高地上焚烧文件的黑烟从8月14日午后一直持续到16日”。<sup>②</sup>日本军政当局焚毁的机密文件难以胜计。所以,战犯重光葵在战后供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sup>③</sup>田中奏折集中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侵略方针。

由东方会议所确定的控制中国之目标,并未能够实现。中国的北伐战争进展顺利,统一了关内地方,不久新疆的杨增新政府宣布归顺南京政府。当日本炸死张作霖之后,东北也未出现日本所期望

①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5~59页。

②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第1703页。

③ (日)《重光葵著作集》(1),第15页。

的局面,张学良以“少帅”身份继任东北保安司令职,控制住局势。1928年底,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通电服从南京政府,在管辖境内挂出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至此,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基本统一了除苏联控制的外蒙之外的中国行政。

中国局势的演变,在日本国内引起震动,政府内部发生分歧,田中本人被迫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则要求推行更为直接的战争政策,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少壮派、幕僚派组成的法西斯团体“一夕会”,更将“解决”满蒙作为三条纲领之一。其成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先后调关东军任职。石原在赴任前夕发誓说:“在我的任职期间一定要完全解决满蒙问题,”<sup>①</sup>其后如愿以偿。石原被军国主义分子称为“满洲国之父”。

### 中国政情变化与日本的战争挑衅

按日本明治以来的大陆政策,中国是日本最为重视的假想敌国。从战略学通常所谓的两极化原理看,中国的统一与兴盛,就意味其大陆政策遭受挫败。故遏止中国的革命与新兴气象,特别是阻止随北伐而来的统一趋势,是日本自20年代加紧筹划对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本是一个文明古国,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束缚,自明清以来逐渐落伍于世界。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有封建专制,外遭列强侵逼,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在这动荡时代,涌现了大批仁人志士,他们发起一次次的革命或变革,力图使国家除旧布新,让民众洗心革面。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1911年推翻清王朝,结束了数千年帝制;随之又有1915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形成新的反封建浪潮。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配合孙中山的国民党改组,建立统一战线。1924年正式创办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为现代军事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1926年,以国共合

---

① (日)《历史和人物》,昭和59年,第2期,第89页。

作和多派系合作为政治基础的广东国民政府发动北伐,先后打败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进入长江一线。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过程中,国民政府发生严重分裂,形成武汉、南京两个临时政府,同残存在北京的民国政府三足鼎立。1927年5月,南京武汉临时政府同时北伐,推进至河北山东一线。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转折时期。

眼看北洋政府即将覆灭,南方国民政府将统一中国,日本军国主义遵照既定的对华侵略方针,实施干预。5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以保护侨民为由决定出兵山东,调动驻满洲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并由海军编成第二遣华舰队,6月1日在青岛登陆。日本在此期间召开的东方会议,进一步确认了日军行动。7月8日进占济南,从而控制了山东心脏要地。日军这次出兵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军事行动实现“廿一条”所提出的控制山东的目标,再是庇护北洋政府,阻止南方势力北伐,维持中国的分裂混战形势。在日本看来,保持中国内部的分裂割据,显然有利于日本。

1928年4月,南方政府再度宣布进行北伐。日内阁于4月19日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驻天津日军编成济南临时派遣队侵入济南,另调第六师团在青岛登陆。5月2日进入济南的日军已达6个大队。<sup>①</sup>5月3日北伐军进入济南,但旋即于5月5日离开济南继续北伐。日军不顾国际公法,派兵冲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抓捕南京政府新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人。蔡据理斥责日军的蛮横行径,竟被日军割去耳朵、鼻子和舌头,最后被残杀,随员17人遇难。日军还放火烧毁了外交公署办公楼。5月7日日军提出最后通牒,有“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路沿线20华里以内驻扎”等6项条件,并限12小时内答复。由于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于两日前北上,日军便以未得到答复及日侨有伤亡为理由,

---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81页。

对留守的少量华军及和平居民实行进攻,遵照军部“显扬皇军威力”的命令,大肆进行杀戮。5月9日又增派第三师团,到5月11日完全占领济南,对该城实施蹂躏。据国际红十字会统计,日军共杀死中国军民6123人,伤1700多人,火烧房屋1000余家。<sup>①</sup>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日军在山东攻城掠地的同时,又准备在河北及辽东展开行动,准备派第十四师团等部进占山海关、锦州等地,关东军司令部进驻奉天。其目的是将中国军队包括张作霖的东北军阻滞在长城以内,削弱中国在东北地区军事力量。日军向有关部队发布了动员令,并向英美等国使馆作了通报。但是,英美立即表示反对,中国南北双方也都提出抗议。日军最高统帅部和政府认为攻占锦州时机尚早,以另有任务为由电令关东军停止出动,<sup>②</sup>关东军主力集结奉天附近待命。

张作霖是依靠日本起家的军阀,但他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在处理东北地区的内政和外交问题方面,曾采取了一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措施,使日本深感不满。日本对张的要求是:“如果张专心治理东三省治安,这不仅是张本身的利益和幸福,而且也是在满蒙拥有错综复杂利害关系的日本最希望的。”<sup>③</sup>张作霖在吴佩孚、孙传芳等派势力被消灭之后,曾于1927年6月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最后一位总管。日本对张日益不满:“帝国应当尽快地把张作霖个人的浮沉同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问题,截然区别地予以考虑。”<sup>④</sup>筹谋换马,用“外科手术”除掉张作霖,另立傀儡。

1928年春北伐军逼近京津地区,日本分别于5月18日对蒋

---

①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6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84页。

③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1页。

④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98~100页。

和张双方发出警告：“战事如进展到京津，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帝国政府为维护满洲治安，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置。”<sup>①</sup>对此，张召集部下，经商议后答复日方说：“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sup>②</sup>日本十分恼怒，决定实施预定方案，趁张退回东北之际，于6月4日在皇姑屯附近铁路埋下炸药，炸翻张的专列，张重伤身死。同时调集关东军主力，准备出兵占领沈阳、锦州等要地。在他国炸死了相当于国家首脑的人物，这就是日本国内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的皇姑屯事件。

日本炸死张作霖的目的，正如其策划者河本大作供认：“一个张作霖垮台，其他所谓奉系将领必将树倒猢猻散。”<sup>③</sup>日军则可以重新扶植亲日政权。但是，张被炸之后，东北地方当局采取了妥当的保密措施，声称张作霖只受了一点轻伤，日军不知虚实。奉军秩序井然地从关内后撤，张学良化装返回沈阳，在张作霖等人支持下接任东北保安司令，收束军事，稳住了局势。日军1928年间在山东、辽东等地的军事行动以及炸死张作霖等一系列事件构成了日军对华的严重战争挑衅，实质是1931年开战的一次预演，它使中日关系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对华战争的严重挑衅。而中国无力对抗，则又进一步刺激了日军胃口。日军威迫张学良：“如果东北当局与南京政府合作，日本即采取自由行动。”<sup>④</sup>张顶住日方压力，坚持同南京政府协商，并在修筑铁路、税收、旅行入境等方面，采取实际措施维护东北地区的民族主权，限制日本扩张。由于张作霖之死，家仇与国难集于一身，促进了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靠拢。南京政府派出代表王士珍、邢士廉等人同张联络，美国公使马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83页。

②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第395～396页。

③ 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217～218页。

④ 《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克漠也到沈阳,参与斡旋,支持张回归南京政府。1928年12月29日凌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通电全国,“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日本意图落空。至此,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下获得了统一。

中国的革命形势仍在发展,各种政治斗争还在继续。为加固统治,蒋介石在1928年先后抛出《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以及《政治问题决议案》等军事、政治纲领,力图削平各地方军阀和政治异己。结果造成各实力派间矛盾激化,先后爆发了1929年3月蒋桂战争,10月蒋冯战争,11月第二次蒋桂战争,12月蒋唐战争。到1930年5月更爆发空前规模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此战由于张学良通电拥蒋,出面调停,战争才以蒋的胜利告终。这次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投入兵力100余万人,死伤者达三四十万。大战刚结束,蒋发动对红军的第3次大围剿,中央军主力长期被用兵于中国南方。1931年夏,长江流域空前大水灾,受灾人口达5000万人。

兵燹、天灾交相逼迫,极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国力,严重损害了对日国防。正是这种衰弱与混乱,使日本敢于犯险发动战争。

### 东北亚国际关系与日本的战争抉择

中国的形势发展同国际格局有着密切联系,国际局势的变化,又必然影响到中日关系。东北亚国际关系特别是1929年的中东路战争,对于中国的内政及中日关系又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战争的起因是国民政府的北伐统一初告完成,同时又着手外交领域。一方面妥协地解决南京事件、济南惨案,另一方面提出“革命外交”以实现国民党之民族主义纲领。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宣言,7月7日发表重订条约的宣言,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办同列强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在近两年的改约外交中,虽收回了一部分关税主权和威海卫租借地,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处境,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化。

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需要解决的课题之一是铁路问题。这

首先激化了中苏矛盾,直接影响东北亚国际关系。中东铁路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难题,在整个 20 年代始终困扰着中苏关系。按 1919 年 7 月 26 日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中东路应该“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苏联后来态度变化,否认了上述宣言。按 1924 年中苏双方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和《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以及东北地方当局同苏签订的《奉俄协定》,该铁路由中苏共管。但苏方不履行条约,独占中东路权益,完全控制着中东路。1925 年苏联同日本订立《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及其议定书,公然宣布“苏联承认 1905 年朴茨茅斯条约继续有效”,公开要求继承由沙俄攫夺的在华殖民权益,实际已经否认了此前多次对华宣言。中国政府要求收回中东铁路,苏联明拖暗拒,于 1929 年 7 月 18 日宣布同南京政府断绝关系。8 月,苏联派兵从三个方面进攻东北地区,并攻占满洲里、札赉诺尔、海拉尔、绥芬河等要地。在 11 月 16 日札赉诺尔一战,东北军坚决抵抗的旅长韩光第以下 7000 余人阵亡,在 20 年代初由北京政府惨淡经营建立的吉黑江防舰队被苏歼灭。中国政府吁请英美等订立《非战公约》的国家调停未果,东北当局被迫同苏签订了屈辱的《伯力条约》。

东北亚最大势力为苏日两家,苏方的扩张必然牵动日本的注视。日军派员仔细侦察并总结了中苏双方作战指挥、兵力素质、战斗情况,并得出结论:“中国军队的统帅指挥拙劣,军队完全如预想般脆弱。”<sup>①</sup>其总结的苏军使用飞机猛烈轰炸、炮火袭击使守军“士气沮丧战斗行动萎缩”的战法,亦为日军重视。两年后,日本在东北放胆行动,其形势判断是“中国忙于内乱,对满洲问题尚无反弹力量”,<sup>②</sup>而这一结论与苏联发动中东路战争不无关系。另一方面,苏联行动还成了日本战争行动的直接借口。1932 年国联大会

---

① (日)《现代史资料》11,美铃书房,第 216 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 311 页。



上,松冈洋右辩解道:日军的行动是因为中国容忍了苏俄势力扩张,威胁到日本在东北利益,故日本在满蒙等地起而自卫。<sup>①</sup>

总之,东北亚国际关系变化,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南京政府的行政统一和“革命外交”,这多种因素不能不直接触动日本在中国的庞大殖民利益,并与日本既定的大陆扩张政策相碰撞。日本军部以中国的正当要求作为发动战争的口实,鼓吹满蒙是日本生命线,明确提出在满洲“要么总退却,要么使用武力解决,二者必择其一”,<sup>②</sup> 战争必不可免。

---

①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第2册,第270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10页。